

● 国学传承丛书
丛书主编◎谢俊美

平生风谊兼师友

胡适

他的弟子

李永福◎著

全国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东出版集团

学传承丛书 丛书主编◎谢俊美

生风谊兼师友

胡适和他的弟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生风谊兼师友：胡适和他的弟子 / 李永福著. —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 5

(国学传承丛书 / 谢俊美主编)

ISBN 978 - 7 - 5406 - 9022 - 9

I. ①平… II. ①李… III. ①胡适 (1891 ~ 1962) — 传记 IV. ①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4368 号

责任编辑：吴曼华

责任技编：肖作勤

封面设计：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 - 15 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24 开本 8.625 印张 173 000 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 000 册

ISBN 978 - 7 - 5406 - 9022 - 9

定价：2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 - 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 - 87621848

序

序

一时代有一时代学术，受历史限制，每一时代都会呈现不同学术趋向。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中国学术的转型期，因求学背景及为学旨趣的差异，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学人无疑是这一时期中最大的亮点。

不可否认，胡适是学贯中西的大师级学者，“九年的私塾教育”奠定了他国学根基，上海六年洋学堂经历以及随后七年的留学生涯，又使得他在西学研修上占着先机。学于西洋而又不荒于国学的磨砺，他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沟通中学与西学的重任。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最为执著的方法论，以中国固有的校勘、训诂、考证之学，杂糅西学的归纳及逻辑推理，尤其借重了赫胥黎的怀疑论及杜威的思维五术，组合成以上方法论。该口号在理论上似无偏颇，而在运用上也几乎无所不能。

以独到的治学方法裁剪中国古代思想史是胡适的大胆创举，先前的《文学改良刍议》虽作于美国，却能在故国一炮走红；他的博士论文未被哥伦比亚大学答辩组通过的尴尬心境，丝毫不影响他在国内

的“如鱼得水”，也正是靠着这篇被“枪毙”掉的博士论文，他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确立了他的学人地位。

胡适的“墙外开花墙内香”，不排除幸运的成分，陈独秀的频频举荐及蔡元培的大胆聘用，只是为他施展才华搭建了平台，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为学趋向合上了中国节拍。

单论国学知识，胡适称不上大家，像王国维、陈寅恪之类的“专才”，就是坐穿板凳，他也绝难赶上；西学知识，以将近二十岁的年龄出国深造，远逊于幼年时就漂洋出海者，在“反叛”的程度上，他下不了真正的“全盘西化”的决心。胡适聪明地选择了中学与西学兼通的新路子，靠着“专家之学”与“通才之识”的巧妙嫁接，他做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学术性贡献。

胡适的学术成就主要圈定在文学与哲学，史学只是他的“训练”。文学方面，以文学革命中的诸多表演为端绪，《白话文学史》是他把实践提升为理论的结晶。哲学方面，《中国哲学史大纲》可称为“典范”之作，难以完结的“中古思想史”则是它的余脉。以上两部“半部之作”，既是他的“职业”所在，又是他的“娱乐”所系，而所运用的写作手法则是活脱脱的“胡适版”。

胡适把“训练”等同于方法，他终生的情结都在弘扬他的“治学方法”。学术传承不外两条途径：一者在于学问本身；二者靠弟子的张显。“胡适之学”自有它的魅力，就是不幸沦为“绝学”，它亦有令人回味研究的资本。因着这种魅力，汇集在“胡旗”下的众弟子在各自方向上的扩张性研究，更“膨胀”了“胡学”的声望。“胡适之学”之所以能大行其道，还与他的“磁性”人格有关，若把镜头放大，参照同时代的诸位大师，又有谁家学说能如此“张扬”，请记住，“胡适之学”一点没有借助行政之力强制推行的印痕，从这一点讲，学派奠基人的人格魅力显得尤为重要。

“胡学”的首批感召者以傅斯年与顾颉刚为代表，由他两个领衔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古史辨”派，类同于胡适挂帅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徒间的声息相通，为沉闷的中国现代学术建设添写了华彩乐章。

“专才”方面，由胡适“点石成金”者不计其数，最有说服力

的当数罗尔纲的成长历程，以“不苟且”的性格品性，却最终成为太平天国史领域的大家，胡适审时度势的敏锐眼光在这段故事中活灵活现。明史专家吴晗也与胡适有着关联，为了一个难得人才不惜提议修改北京大学旧制，胡适替吴晗鸣不平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小门生”唐德刚与胡适的特殊关系，增添了解读“胡学”的砝码。《胡适口述自传》与《胡适杂忆》不乏唐德刚诙谐的笔调，它亦是引人入胜的堂奥，但若从学术史角度分析，“小门生”的两部大作更像是替“胡学”盖棺定论。

以上荦荦大端仅为抛砖引玉，能否收到良效，确非笔者一厢情愿。该套丛书是一庞大系列工程，承蒙广东教育出版社厚爱，恩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谢俊美教授毅然接手该项“棘手”工程，以不造之才忝得子项目，又受着“胡适热”的炙烤，其中的赘言、烦言甚至是妄言在所难免，还望同行不吝指教。笔者之所以敢贸然献出拙作，一者恩师的充分信任，二者家妻计慧娟女士的全力支持。几年以来，如若缺失他们两位不间断的呵责与督促，我真的不知道要偃旗息鼓多少次，好在文章已勉强做成，是非得失只好任由读者评说，有道是“文责自负”，我静候着人们对我的“裁决”。

李永福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八日

目录

C
o
n
t
e
n
t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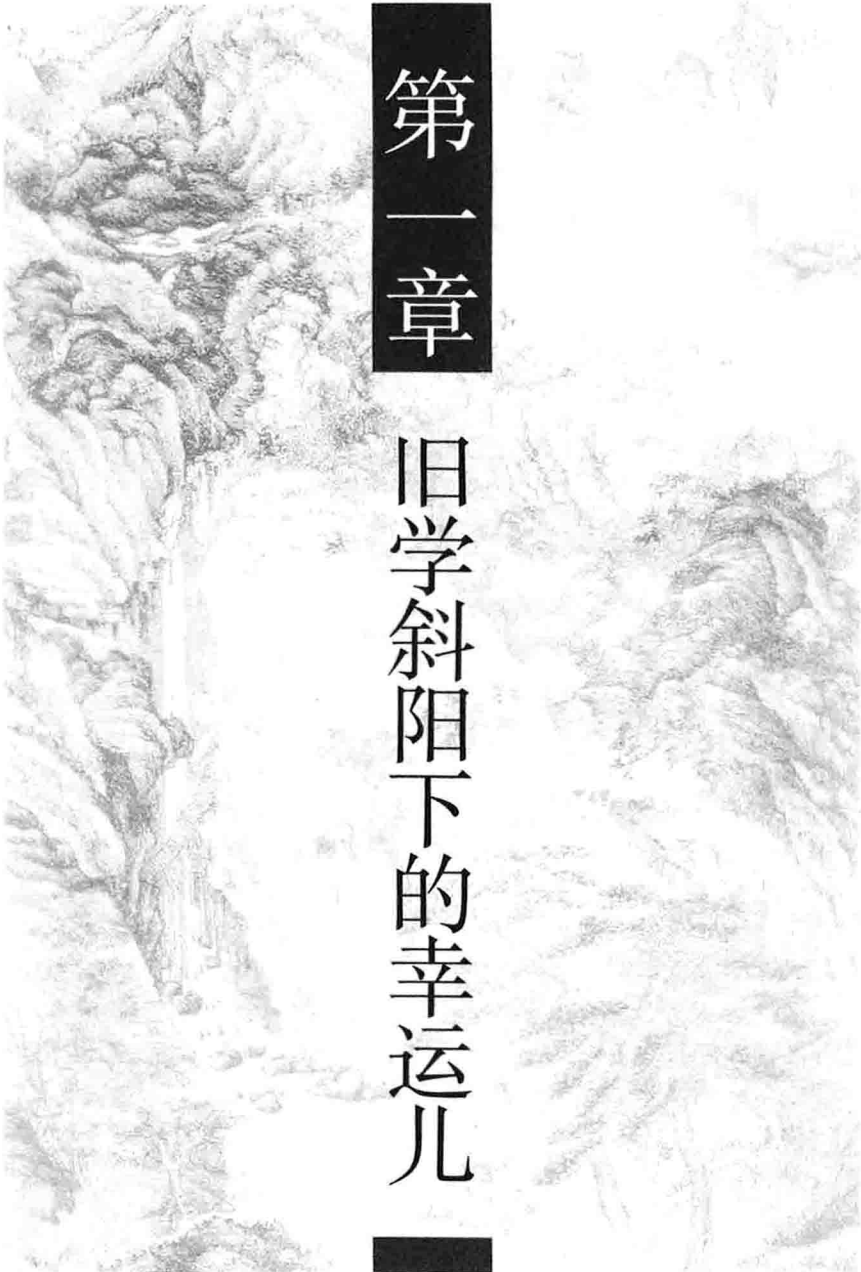
序	1
第一章 旧学斜阳下的幸运儿	1
一、天生敏才	3
二、受惠于“讲书”	6
三、国学根基	8
四、尝试白话文	10
五、初染西学	12
六、幸运中的幸运	15
第二章 “娱乐”中暴得大名	
——胡适的文学成就	21
一、“文学梁山”上的呐喊者	24
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29
三、双线文学观念	34
四、《红楼梦》的“自传说”	38
第三章 “职业”上独辟蹊径	
——胡适的哲学成就	42
一、开山之作	45
二、拿起“绣花针”	50
三、发现了“宝贝”	56
四、难以了结的“旧债”	59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四章 “训练”上的中西合璧	
——胡适的历史学成就	64
一、师从杜威	67
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70
三、传记与自传	73
四、停滞的“训练”	77
第五章 不拘一格降人才	
——胡适的人才观	82
一、“方法”的感召力	83
二、荐人才不论功名学位	87
三、学识重于信仰	90
四、古道热肠	94
第六章 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胡适与傅斯年	101
一、相似的求学经历	102
二、暗中“保驾人”	104
三、主编与顾问	108
四、国外“探宝”	113
五、新工具、新材料的“实验场” ...	116
六、“功劳”与“功狗”	121

第七章 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胡适与顾颉刚	125
一、求学历路	127
二、走向“古史辨”	131
二、北平“三大帮”	136
四、薪火相传	141
第八章 煦煦春阳般的师教	
——胡适与罗尔纲	146
一、初入师门	148
二、幡然醒悟	151
三、偶然的机缘	154
四、小试牛刀	158
五、苦心孤诣	160
第九章 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解读“胡学”第一人	166
一、“小门生”唐德刚	167
二、从“天风”到“白马”的往还	168
三、《胡适口述自传》	175
四、《胡适杂忆》	180
胡适学行年表	188



第一章

旧学斜阳下的幸运儿

旧学，即传统国学，它比照于新学而有此称谓。旧学的内涵及外延极其广博，内容上，包罗中国的所有学问，经，史、子、集无所不融；治学路径上，主要有汉学、宋学方法论之争，复兴汉学的乾嘉朴学也蕴含其中。

新学（即西学）对中国的真正冲击始显于物质技术层面，船坚炮利为其一；声光气电为其二。国人震醒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泱泱大国的溃败，岌岌乎奋起直追，于是乎就有了三十多年的轰轰烈烈的“洋务”模仿运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再次惨败，又一次激醒了国人，他们深深意识到缺乏制度革新作基础的技术模仿是很难获得真正发展的。大量介绍西方政治体制的文章开始引起中国上层社会的关注，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百日维新”粉墨登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由此诞生。虽则它的学制与教学内容与西方近代大学大相径庭，但它毕竟含有现代教育因子。声嘶力竭反对“维新”的老慈禧在重新执掌政权后，又无可奈何地捡起“百日维新”的牙慧，且在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教育改革为例，先是废八股，改科举，到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新的教育体制呼之即出。简而言之，以1906年为界，此后传统儒生靠死读儒家经书由“士”入“仕”之途就此打住，代之以新式大、中、小学堂，虽则仍有名誉上相对应的进士、举人、秀才的虚头衔，但它毕竟是一过渡期。此举对传统学风的影响不可谓不巨，事实上，在此之前，一大批有志于新学的人已开始与传统国学背道而驰，众多的自费、官费留学生就是明显例证，1903年仅在东洋

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就有八千多人。

由传统国学一统天下，到新旧学并陈、中西学互融，生活在此时代的学子们承受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的熏陶，题中的“斜阳”即寓此意，也就是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学术的转型期，学术重构的契机向学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

西学对中学的冲击程度与西方殖民国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同步调，具体地讲就是地缘因素。西学影响的首要区域为东南沿海，次则为长江流域，影响最小的为内陆广大腹地，且有愈往内地影响愈小的递减趋势。

胡适无疑是循此时势的幸运儿，因着他的天赋，他的秉性，由默默无闻的一乡下小儿最终成就了学贯中西、领袖群学的伟业。

一、天生敏才

胡适，原名洪骅，后改名适；字希疆，又改适之；号冬友、小山；笔名铁儿、自胜生等。生于1891年12月17日，出生地虽在西风劲吹的上海，但其早年求学生涯主要在安徽省绩溪县上庄老家。地缘上，皖南偏僻农村在当时很少受到西学的眷顾，“九年的家乡教育”（1895—1904年），胡适仅读过一本翻译小说《经国美谈》，研习国学几乎占据了其生活的全部。

衡量一个人聪明与否，现代社会主要通过测量其智商的高低来决定，它有一定的科学性。以前的评价，则参照其在不同年龄段识字及读书的多寡，虽略显笼统，但也有一定道理。

为胡适破蒙的是他老父亲胡传，胡传为一介秀才，指导一乳儿应绰绰有余，况且在此之前，他也有教私塾的经历。胡适母亲冯顺弟为一农家女，出嫁胡家前，大字不识几个，在夫君的开导下，她也学起了方块字。红纸黑字，方法虽显原始，但也其乐融融。胡适于两岁多开始认字，先是父亲教，后由于他公务繁忙，同为学生的母亲亦加入到辅导小胡适的行列，毕竟她已先于胡适识了不少字。由于父母的严厉督责，再则胡适天生聪颖，胡适识字的本领日渐提高，到1895年母子俩自台湾返乡时，小胡适已认得方块字七百多个，此时的他才三岁八个月。

“九年的家乡教育”对胡适而言，受益匪浅，国学根基由此奠定。

受家学的影响，胡适所学偏向宋明理学。《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性图书对已识七百多方块字的小胡适颇感容易。《学为人诗》是他父亲所编的教材，亦是他人入私塾后所学的第一本书。接着便是《学原》（亦为他父亲所编）、《律诗六钞》、《孝经》、朱子《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等等。待年长后，他还读了《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等书目，并亲手编了一部《历代帝王年号歌诀》，以便于记忆。课堂



胡适的父亲胡传

胡天四十歲小景

之外，他还偷读了许多在当时被视为“禁书”的白话小说，四年中（9~12岁）共读了三十多本，这些书与科举考试无关，故塾师们多反对学生诵读。同期的同学中，与胡适相匹敌的几乎没有，仅有一位族叔胡堇人，已考取了秀才，却大他四岁，他们俩曾暗中进行过阅读白话小说比赛，最终也难分伯仲。这位族叔曾于20世纪20年代参加了由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辨”论，由此可见他的国学根底。

胡适离开家乡远赴上海求学时，还不满13周岁。在沪的六年间，他进过三个新式学堂。屡次的跳班经历再次验证了他不同于常人的资质，当然也有勤学的因素在内。就读梅溪学堂时，曾因指证老师引文错误及所做文章的精妙，竟破天荒地由第五班直跳三级到第二班。几个月后，他又升到第一班。澄衷学堂是当时上海有名的私立学校，与梅溪学堂相比，该校较为重视英文。胡适因英文、算术成绩太差，被编在第五班。该校管理极为严格，每月有小考，半年有大考，且出榜公布，成绩列前三名者有奖品。胡适初进该校时，因有的科目几乎没有学过，影响

到总成绩，但经过努力，他进步很快，成绩常列第一名，所以一年内又跳了四级。

李敖所著的《胡适传》把胡适的聪颖归于父母的年龄结构，为此他遍寻古今中外名人的例子加以诠释，此为一家之言，而立论的前提是肯定了胡适的天赋。

天赋与勤奋是成才的两大要素。胡适有幸两者兼具，且能持之以恒，勤学不辍。胡适之勤奋，在各种版本的《胡适传》中皆有详述，现概而言之，以解读胡适的成就与其孜孜苦读不无关系。

“慈母兼严父”的教诲是胡适正身向学的客观因素之一。因父亲谢世过早，督责胡适学习的重担就落在了年轻寡居的母亲肩上。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多已成家，封建大家庭的诸多烦事着实令这位后母感到无所适从，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于自己亲生的儿子。时胡适尚不满四周岁，每天天不亮，母亲就把小胡适叫醒，让他披上衣服坐着，然后告诫他昨天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令他认错改正，并且要用心学习。学习的榜样则是老父亲，母亲时常提醒他“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丢他的脸、出丑”。诸如此类的“正身”教育几乎成了惯例。东方刚刚破晓，母亲就忙着帮胡适穿好衣服，催他快去上学。胡适常常是最早一个到校，静悄悄地从塾师家拿来钥匙，打开教室门，然后坐下读书，等老师来了，背完书才回家吃早饭。下午继续上学，直到天黑才回家，晚上还要念夜书。如此循环往复的学习生活，胡适在“九年的家乡教育”中几乎一以贯之。

尽力做到名实相符的心理负担也迫使小胡适潜心向学，这也是他成功的另一要素。胡适自幼体弱，母亲又不让他乱跑乱动，所以外表上给人的感觉总是“文绉绉的”。父亲有秀才功名，胡适又肯学，且小有名声，故周围的乡亲们称他为“先生”，并以此为标尺品评他的行为。一次，胡适同小朋友玩乡间常玩的游戏“掷铜钱”，一位长辈恰好路过，笑着问他：“先生也玩掷铜钱吗？”一句玩笑话，呛得胡适好难受。从此以后，他更加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尽力符合“先生”的身份，就是偶而玩游戏，也多扮演文人、文官的角色，小小年纪心思如此沉重不能不归功于母亲的谆谆教诲。为了学习，胡适几乎牺牲了所有爱好。他幼时喜欢音乐，由于母亲的反对，音乐天赋渐渐“枯萎”。图画方面，塾师不但没收了他所有的作品，而且还严禁他私自作画，胡适又失

去了一项喜好。无奈之下，胡适只好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在学习上，这也正是母亲的期望，更符合周围人们的乡议。过重的心理负担不但没能压垮胡适，反而促使他更加努力学习，以期有更大作为。

上海求学时，胡适“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因他敢于怀疑，勇于指正，终得到老师的识拔，由五班直跳三级到二班。因他肯用功，亦经常得到老师的嘉奖，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的经历为最好的注脚。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孤零零的一个孩子”回报“慈母的爱”的最佳方式。

母子分别时，母亲按捺眼泪强装欢笑的表情令胡适终生难忘，毕竟他还不满13周岁，母亲实在有点舍不得，这也是决定他以后人生走向的另一潜在因素。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

二、受惠于“讲书”

胡传卒于1895年8月22日，时胡适才三岁零八个月。胡传临终前曾有遗言：“应该令他（指胡适）读书。”母亲冯顺弟谨守丈夫遗言，克服各种困难，尽其所能，为小胡适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客观讲，胡适少儿时代所师从的两位老师并无高深的学问和显赫的名声，但由于方法对头，胡适“九年的家乡教育”还真收获不小。所谓的方法，即“讲书”的教授方式，简而言之，就是老师每读一字，

须讲清字义，读完一句，要明白一句的意思，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胡母所提供的高额“学金”（学费）。

胡适的两位塾师，前者为四叔胡介如，后者为族兄胡观象。两人均系秀才出身，与世家大族所聘请的高学历塾师不可比拟。教授方法上，因袭传统的讲授法，念古文而不讲解，胡适把此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造成以上窘态的原因，一者，所教授的学生多为农家子弟，学生家长平时关注有限，缺少对塾师的监督。二者，学生少，“学金”又低，塾师收入微乎其微，影响了他们教学的积极性。有鉴于此，胡母提高“学金”以图有所改观，别人每年出“学金”二元银元，他家第一年就拿出六元银元，且每年均有所增加，最后一年竟拿出十二元银元，高出别家五倍。当然，享受如此高的待遇，塾师也应有所让步，讲授方式上必须以“讲书”为主。此讲授法对已有识字根底的胡适尤为适用，当别的同学还在读《幼学琼林》大字课文时，他已深入到读小字夹注了。也许是塾师有所偏爱，抑或是胡适有所用心，抑或是别的同学比较淘气，并没有认真听讲，不知不觉中胡适的学识大有长进。有一次，一个同窗好友拿着一封信来问他，请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这令胡适很纳闷，因为该同学已读过“四书”，完全能够明白该句的意思，这件事也使胡适深深地懂得“讲书”的好处，他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

课堂上的胡适是忠实的听众，课后的他也尝试起“讲书”来，此种经历对他演讲天赋的培护不无裨益。胡适的听众是本家及邻居家一帮女孩子，农家女孩子在当时多不进私塾读书，帮大人干活之余，她们的精神享受就是听老人们絮叨一些故事。胡适本家星五叔是以前的“主讲”，待胡适阅读大量书籍之后，居然也觊觎此一领地。小胡适不像星五叔需烦劳别人捶背、装烟、点火，但也有别的好处，每次讲完故事，小姑娘们都争着去泡炒米，或是做鸡蛋请他吃。小胡适也过上了受人“巴结”的日子。如此的“讲书”，逼使胡适把书本上的古文翻译成绩溪本地话，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古文的文理，所以他14岁（实不满13周岁）到上海读书时，就能做很像样的文章。

胡适初到上海时，因性格内向，衣着落伍，给同学们的印象是典型的“乡下人”，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屡试锋芒之后，他已改变人们

的看法，尤其在学识方面，同学们都以他为楷模。澄衷学堂后期，他还当了班长，一改过去一见人就面红耳赤、问一答一、问二答二的腼腆性格，经常登台演讲，侃侃而谈，这一经历可视为在乡间给小女孩讲故事的接续。中国公学三年，他更注重演讲的锤炼，他的好朋友赵元任曾回忆道：“他给人的印象是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当时大家都留着辫子，胡适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的时候就说要把辫子拿掉。他的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此段回忆的意境是胡适出国途中的情状，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胡适的个性已改变了许多。凭着健谈、爱辩论的性情，他在留学期间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留美学生中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也正是他的自信心才成就了他所倡导的“诗界革命”。

三、国学根基

总体分析，胡适少儿时代所受的国学教育有所偏颇，这也是科举时代“儒学一尊”的时代烙印最直接的体现。“四书”与“五经”是经学的根基，宋明理学自明代以后成为科举考试的圭臬，偏重儒学、专攻经学成为社会时尚，胡适自然也不例外，研习“四书”、熟读“五经”，熏染宋明理学构成了其学习生活的主旋律。父亲亲编的两书《学为人诗》及《学原》属宋明理学的“敲门砖”，其中的“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知，反躬践实，虽勉于学，守道勿失”则是其方法论的概述，这寥寥数语，对胡适一生有重大影响。

胡适于11岁时开始涉猎史书，先是老师教他看，待熟练后，再由自己断句、点读。《纲鉴易知录》有句读，看起来比较容易，而《御批通鉴辑览》却没有，这就需要在读的过程中添加断句的工作，速度自然慢了下来。《资治通鉴》是史书的精粹，在二哥的建议下，他又改为点读《资治通鉴》。为了方便记忆，他还编了一部《历代帝王年号歌诀》。以上治学方法为他日后从事的“整理国故”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子类书籍产生兴趣，实缘于品读梁启超所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的心得。积极方面，胡适认为该书“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并把该书看做学术界的开山之作，即第一次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中国的学术思